



全面提升金砖机制“含金量”

□ 郑归初



当前，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拥有世界26%国土、42%人口、24%经济总量的金砖国家，同样遭遇多重逆流，内外困难聚集。值此重要时刻，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首次以视频方式召开，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的重要讲话，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抗疫合作大计，共绘金砖发展蓝图，提出用实际行动建设美好世界的五个“坚持”，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指引方向，就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全球抗疫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释放强劲信号，展现金砖合作机制的巨大生命力。

过去10多年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合作基础日益夯实，领域逐渐拓展，包括成立新开发银行在内的一系列成果引人瞩目，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性力量。在当前多边机制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更加突显。

在金砖国家合作发展历程中，中国是金砖机制的倡导者、“金砖精神”的践行者、金砖合作的重要引擎，一次次推动“金砖国家”团结前行，爬坡过坎。2017年，中国在厦门成功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进一步巩固金砖团结协作良好势头，奏响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乐章。现在，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再次引领潮流，向金砖国家和世界各国分享宝贵经验，为重塑后疫情时代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中国引领抗疫合作，展现扶危济困、立己达人的“中国担当”。疫情肆虐下，全球遭受重创，中国与各国休戚与共、并肩作战。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推动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除偏见，扫除“政治病毒”，凝聚起各国携手抗疫的最大合力。中国郑重

宣布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使用，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致力于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设立疫苗研发中国中心，推动五国疫苗联合研发和试验、合作建厂、授权生产、标准互认等工作。一项项扎扎实实的举措，为合作抗疫注入了动力，提振了信心。

中国把握时代脉搏，为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注入“中国力量”。中国始终是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和团结合作的推动者，也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关键参与者。新冠肺炎疫情如一道“闪电”，照出全球治理现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愈演愈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对此，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也不可能逆转。习近平主席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呼吁金砖国家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高举多边主义旗帜，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气候变化、全球减贫、绿色安全、数据安全等领域加强深度和广度合作。中国正在为充满不确定性世界赋予正能量，增加稳定性。

中国坚持扩大开放，为应对全球衰退、复苏世界经济作出“中国贡献”。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作

为今年有望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这个“火车头”不负众望，为各国经济复苏“加油出力”；今年以来，中国作为南非、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稳固，同两国双边贸易逆势上扬；从俄罗斯农产品进口大幅增长28.5%，成为俄最大农产品出口国。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宣布将在福建省厦门市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打造金砖务实合作旗舰项目，全面提升金砖机制的“含金量”。随着新发展格局紧锣密鼓推进，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必将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拓展发展机遇，开辟互利共赢的光明前景。

“精感石没羽，岂云惮险艰。”金砖国家合作面临挑战时，中国从不缺席，更不会退缩，而是以实际行动协助跨越难关。如今，金砖国家合作又到了一个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关口，中国持续贡献思想和力量，不断提升金砖机制的韧性和金砖合作的“含金量”。本次会晤是特殊时期的一次特殊会议，必将在金砖历史上留下特殊的印记。中国将铭记金砖合作的初心使命，继续与各国同舟共济、风雨兼程，积极扩大利益汇合点和合作切入点，努力打造成色更足、成果更实、赋能更强的金砖合作，为深化南南合作凝聚更大共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上接1版）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和活力。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培育更有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各类市场主体。要全面完善产权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治理效能。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要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保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构建生态文明体系。要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不断改善空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降低碳排放强度。要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要高度警惕“黑天鹅”、重视防范“灰犀牛”，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强化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确保粮食安全，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维护金融安全，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一部部署，九分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的宏伟蓝图要靠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辛勤工作和努力奋斗去实现。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心同德、顽强奋斗，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菲律宾经济体量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发展势头一度被国际看好。到了80年代初期，菲律宾在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却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从此再也没有跳出来。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向好的国家为什么发展势头会突然急转直下，经济增长回落甚至停滞不前？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掉入陷阱的激发器

西班牙殖民者300多年的统治和美国在菲律宾推行半个世纪的“非化政策”，培育和拉拢了当地一部分精英，他们掌握政府主要权力和大部分社会财富，成为菲律宾的“上层阶级”。高收入阶层把大量的财富用于盲目追求奢侈性消费或进行投机，而不是用于提高资本的投资率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扩大再生产。产业因享受不到资本的“涓滴效应”而无法升级，无法升级的产业因市场竞争被淘汰，大量的城市产业工人面临失业危险，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因此形成。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这种高度依赖美国、缺乏自主性、畸形而脆弱的经济模式使菲律宾经济一击即溃，大量城市工人如潮涌般失业，一夜返贫，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积压已久的阶层矛盾爆发。近年来，虽然菲律宾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降低贫困率，但收效甚微，基尼系数一直相对较高，从1985年到本世纪初，菲律宾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上。收入差距拉大导致经济进入停滞模式，经济停滞导致社会进入动荡模式并一直延续，原先在社会深层存在的宗教、族群、阶层矛盾也进一步发酵，社会动荡上升为政治动荡，社会治理的高成本使菲律宾在国家治理上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丧失了跳出陷阱的机会。

缺乏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是掉入陷阱的直接原因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原有产业基础的边际效应递减，及时根据发展形势需要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和动能转换，促进经济转型，是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推动力。在同一时期的日本、韩国积极寻找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通过有效的产业引导政策，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升级为资金密集型重工业，最后升级到技术密集型信息业，不仅发挥传统生产要素全部动能，而且激发新兴生产要素的潜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刺激经济增长保驾护航。相比之下，菲律宾错过动能转型升级之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菲律宾的工业因缺乏主导产业，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开始出现占比偏低的现象；到90年代，工业部门出现了寡头垄断，排斥外商直接投资，革新动力减弱，效率低下。服务业转型升级也并不顺利，高度依赖传统的劳务外包和劳务输出，单一化明显。再加上政府将大部分贷款投资于重工业、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受到挤压。菲律宾因此并没有像日韩等国那样顺利完成工业化过程，并进行转型升级，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因国际竞争加剧失去了比较优势。

营商环境恶化是掉入陷阱的间接原因

在变革时代，政府的引导力与执行力是经济转型升级的背后推动力。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和营商环境提升发挥好指挥棒作用，通过政治生态的改善来促进整个经济生态的提升。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动乱、社会不稳定，菲律宾政府虽然出台了经济改革方案，但由于政治环境紊乱，很多政策根本无法落实。在营商环境方面，菲律宾历年来的全球排名靠后，很多指标的表现比周边国家要低很多。自1998年以来，菲律宾政府财政赤字畸高的现状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内税收严重不足，对外负债率也比较高，财政状况不佳导致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高新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因缺乏有效投入而成为经济复苏的阻碍。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政府内部系统性的腐败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政府官员、企业甚至媒体、司法部门的贪污已经根深蒂固，大量国家财政资金被侵吞。政治生态恶化，营商环境无法得到有效改善，国外投资因此受到抑制，新兴产业难以生长，高素质人才也因此流失严重。治理不善成为推动菲律宾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间接推手。

政局动荡不稳是掉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菲律宾在政体建设上模仿美国，几乎是生搬硬套地搞美式民主，这种做法一度被西方国家认可，称之为东南亚民主国家，但这并没有给菲律宾人民带来福祉。由于美式民主水土不服，国内民族、宗教势力文化影响深厚，所谓的民主改革也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一场场灾难。政客们以大家族为代表形成寡头政治，党同伐异，堕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后时期就是菲律宾历史的独裁政治时期。即使重新按照美式民主的运行章程来进行民主选举和政党轮替，但贿选、作弊、极端暴力事件等西方民主内生性丑闻始终无法根治，如影随形。政权无法实现良性更替必然引发政局动荡，地方分裂势力众多，派别林立，大规模游行示威、军事政变频频出现，甚至一届政府任内出现多次兵变，一次一次将脆弱的民主制度、经济发展秩序拖入深渊，多届政府因此而倒台。寡头政治工于算计，分裂势力划区而治导致中央政权地位不稳，再加上长年累月的政治腐败表明国家结构和基础在根本出现问题，政治动荡和社会衰败就不可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迈岀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系统推进国家治理是规避陷阱的必然选择

国家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之间紧密相关，总体平衡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从菲律宾的困局中可以看出，这些生态都存在诸多问题，政治失灵、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同时存在。菲律宾起初的政治民主体制改革并没有为国家带来长久的福祉，反而因为水土不

菲律宾的『中等收入陷阱』

□ 栾晓峰

服将国家拖入陷阱。因此，在根据国家传统历史文化及现实选择正确的道路之后，追求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的动态调整与平衡，在动态中实现主体相互制约，在动态中寻找力量平衡，经济社会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汇聚积极力量，保持良性运行和发展，才能顺利跨过陷阱。

稳定与创新是规避陷阱的双重价值遵循

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效应递减，对经济的拉动力和贡献率下降，在新的生产要素生产率没有充分激发之前，政府创造的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政策引导就特别重要。菲律宾政体一直不稳，中央权威经常受到挑战，无法聚精会神发挥引领作用。而反观同时期的日本、韩国等国，政体相对稳定，其实质就是强调政府的权威，稳定而连续的中央政府力量成为确保整个国家政体稳定的核心，为经济转型升级释放出持续的政治红利，经济的长期繁荣得以实现。在强大中央政府的引领下，及时适时调整经济刺激策略，调整收入分配的方式，改善投资的效率，创新战略、创新驱动、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得到有效打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得到厘清，收入与分配关系、效益与福利关系得到均衡。统一稳定的政体是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根本保障，多层次创新驱动是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根本动能，这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施加了双重保险。

